

【法学研究】

从沙特协商会议看王国的政治民主化变革

马福德

(西北大学 中东研究所, 陕西 西安 710069)

摘要:1992年3月沙特国王法赫德下令成立沙特协商会议,它以伊斯兰“舒拉”精神为基础,汲取西方现代民主制度中的某些方面,并加以整合与改造,使之成为独具特色、符合具体国情的王国政治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不仅是王国政治民主化变革的重要开端,同时,也是阿拉伯伊斯兰国家根据自身条件进行的政治民主化改革的表现方式之一,其潜在意义远远超过了现实意义。另外,沙特协商会议是王国国内各种政治力量彼消此长的反映图、政治民主化进程的晴雨表。通过研究,我们能较为客观地把握其未来的政治走向。

关键词:沙特;舒拉;协商会议;政治民主化

中图分类号:D815.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6248(2005)02-0073-05

From Saudi negotiatory conference to analyse its political democratic renovation

MA Fu-de

(Institute of the Middle East Studies, Northwest University, Xi'an 710069, China)

Abstract: In March 1992, Saudi king Fahder decided to establish the saudi negotiatory meeting, which was based on Islamic spirit and merged western democratic system with characteristic that accord with the situation of a Saudi Arabia. Not only is it the outset of the political democratization in Saudi Arabia, but also it is Islamic country carry out the innovation. Saudi negotiatory meeting is the picture of Saudi Arabia forces who are ebb and flow. From it, we can grasp its political trends in future.

Key words: Saudi Arabia; sula; negotiatory meeting; the political democratization

沙特阿拉伯王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石油输出国,也是一个拥有伊斯兰教两大圣地、政教合一的伊斯兰君主制国家。其内外政策不仅牵动世界经济的神经,而且也会在伊斯兰世界激起层层漪澜。1992年3月沙特国王法赫德下令成立“沙特协商会议”(Majlis-Alshura),并颁布了与其相关的规章制度。这是沙特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它标志着沙特向政治民主化改革迈出了实质性的一步,更重要的是,其潜在意义远远超过了现实意义。它将对王国未来的政治生活产生深刻影响。同时,它也是我们观察其政治民主化变革的一个窗口。

一、“舒拉”及其在沙特王国历史中的嬗变

(一)“舒拉”的概念

“舒拉”一词意为协商,是伊斯兰政治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源于《古兰经》和圣训以及先知和其弟子们的言传身教,因而,在伊斯兰教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大到国家事务,小至家庭生活中诸如婴儿何时断奶等琐事,都被要求贯穿“舒拉”之精神。但值得注意的是,在政治层面上,它与西方的民主有根本区别。西方民主基于人民主权的概念,它可以自由行

收稿日期:2004-10-21

作者简介:马福德(1970-),男,回族,青海乐都人,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博士生,西北民族大学外国语学院助理研究员。

©1994-2016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使其绝对权力。而“舒拉”则不然,它局限于经训明文未涵盖、确立的范围。经训虽然概括出了“舒拉”的理论根据,但就其具体表现形式则无明确、具体规定,旨在给社会必要的回旋余地,让其尽可能地发挥主观能动性。因此,在其政治实践中产生不同的理解和表现方式是必然的。

(二)“舒拉”在早期沙特政治中的实践

1927年,经过20多年的奋斗,伊本·沙特终于建立了一个独立的民族国家。然而,当时王国的社会、经济和文化极端落后,再加上在近代史上未受过殖民统治,几乎没有接触或受到过外来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影响。就这样,除了祖辈留下的传统和伊斯兰教义外,没有任何法规性的文件来作为伊本·沙特实施统治的依据,更谈不上对现代政治制度的研究。因此,常常把原有的部落民主、非政治层面的“舒拉”与政治上的“舒拉”混为一谈,缺乏现代政治之精神。比如把因形势需要而召开的部落会议,就某一问题征求专家的意见,甚至会见普通百姓,倾听他们的冤情和困难都被冠以“舒拉”之名。就“舒拉”在沙特国家政治中的实践,其大体经历了探索、停滞、发展三个阶段和不同表现形式。

1. 探索阶段(1926~1954年)

1926年,伊本·沙特建立了第一个“舒拉”机构——咨议会议,但其实际上是他的私人顾问小组。1927年他下令成立了由王储为主席和其他8个专职人员组成的咨议会议,并亲自主持了第一次会议。1932年,重组后的咨议维持到了1935年。1936年,咨议会议再次重组,这次包括主席,第一、第二副主席和10名专职委员,并且运转了将近17年。1953年,伊本·沙特对咨议会议进行了其生前的最后一次改革,他把13名成员扩大到20名。

这一阶段,王国正值起步时期,需处理的国家事务不太复杂而且较少。现代官僚机制也尚未建立。所以,虽然没有法规性文件明确咨议会议的职责,但它实际上发挥着内阁的作用,不仅拥有很大的权力而且不受其它机构的制约。

2. 停滞阶段(1954~1992年)

1954年,应王国经济与社会发展形势的需要,沙特现代官僚机构——大臣会议应运而生,并开始运转。原来咨议会议的绝大多数权力移交大臣会议,其职责只限于偶尔的咨议,最终成为一种象征性的机构。

3. 发展阶段(1992年以后)

1992年法赫德国王下令成立了沙特协商会议,

并颁布相关文件,明确了其组织形成、权限和职责范围等。至此“舒拉”真正被赋予政治涵义,其职责从被动的咨议转变为主动的参政议政,其组织方式以法律的形式确定下来。从而确立了其在王国政治体制中的重要地位。

二、协商会议成立的背景

沙特协商会议的成立是国际因素和国内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在国际环境方面,20世纪80年代后期,东欧发生巨变,苏联解体,一股被亨廷顿称为民主第三波的政治民主化浪潮几乎席卷全球,它甚至冲击了一些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封闭、最不可能发生变革、常常被人遗忘的角落,如缅甸、蒙古等。地处东西方之间的中东更是首当其冲。亨廷顿认为,1990年的东欧巨变不仅影响到一些阿拉伯国家迈向自由化的运动,而且民主化的滚雪球效应直接推动了埃及、约旦、突尼斯和阿尔及利亚的领导人不同政见的表达开放了更大的空间。他同时指出,作为民主化的主要推动者——美国,在海湾危机期间派遣50万大军部署该地区,并在战争结束后仍维持数量可观的军队长期驻扎。这不但激发了包括沙特阿拉伯在内的海湾国家政权中追求民主的运动,而且为其提供了外在的原动力^[1]。在国内,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石油主权由外国公司逐渐转归国家,沙特石油工业突飞猛进得到长足发展,石油收入也滚滚而来。凭借不断积累起来的巨额石油资金的支持,沙特政府于1970年到1990年先后制定和实施了四个五年计划,共投入约2万多亿里亚尔^[2]。主要用于以石油为主的工业、农业、人力资源发展和基础设施建设。这些大规模投资计划的实施对沙特的经济与社会产生了深刻影响。首先,它使其原先的以传统农牧业为主的自然经济转为以新兴油气工业为骨干的现代化经济。其次,它动摇了王国原有的社会结构之根基:一是人口社会结构发生变化,到1980年,曾占全国人口一半的游牧民锐减到总人口的5%,曾占总人口的35%的定居和半定居农业人口,减至25%,而曾仅占10%的大城市居民猛增到50%^[3]。二是它促进了王国从原先单一的游牧社会结构过渡到由工人阶层外籍劳工和中产阶级等构成的多元社会结构。这些在经济社会方面的巨大变化促使人们的价值观、思想观念等发生变化,使得民主成为可能。最后,在其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一些诸如社会分配不公、权力垄断等问题,引起普通民众尤其社会精英的不满,并以不同形式表达之,其中二股势力引人注目。

(一)渴望参政和推进民主的中产阶级

中产阶级是伴随战后沙特社会经济和现代教育的发展而逐渐形成的一个新的社会阶层。它包括具有现代意识的新型文职管理人员、承包商、企业家、工程技术人员、知识分子等。据有关资料显示,1990年其人数约在80~100万之间,并不断扩大,是沙特城镇中最大的社会阶层^[3]。他们通常受过良好的教育,掌握着较高的文化知识与科学技术,在国家各个领域特别是经济领域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同时也是推动国家现代化发展的重要力量。尤其在海湾战争后,他们的参政意识高涨,并积极通过各种渠道来表达参政的愿望,主张“政治改革”和实行“民主制度。”早在1990年11月以前沙特新闻部长穆罕默德·亚马尼和沙特工商会长阿卜杜拉·达里夫为首的43名沙特政府官员和著名商人上书国王,要求建立协商会议,推进政治民主,限制宗教对行政的干预,对宗教警察实行彻底改革等。透过这些要求,可以看出他们对王室权力垄断的不满。因为就上书国王本身就蕴含着对王室权力的质疑。何况,此要求的实质直接危及王室权力的根基——由伊斯兰教提供的合法性。此次行动促使王室真正感到来自日益壮大的中产阶级的巨大威胁。

(二)要求实现社会公正的伊斯兰主义者

海湾战争期间和战后,大批美军驻扎沙特,催化了其国内原有的各种矛盾。许多不满王国社会生活中存在的不公现象的沙特穆斯林,想借宗教之力量,来实现社会公平和公正。于是,新兴的伊斯兰主义者的队伍迅速壮大。他们借美军在沙特的存在严重违背了教义规定为由,开动宣传机器,大造舆论,频频向政府施压,要求政府反对“自由化”和“多元化”,重新确立伊斯兰教的绝对地位。作为对民主人士的上书行动的回答,他们于1991年5月向法赫德国王呈送了一份由57人签名的请愿书,继而又在1992年9月经沙特穆夫提谢赫·伊本·巴兹之手向沙特政府转递了一份由107人签名,长达45页的《劝告备忘录》。其内容主要集中在两点上,第一,建立独立的、具有决定沙特国内外政策实权的协商会议;第二,重新确立伊斯兰教至高无上的地位,统一司法机构,组建最高沙里亚法庭,并确保其对一切法规和条约的审查与修订,赋予伊斯兰学者对政府一切机构和部门工作的监督和参与权等。

虽然这一举动与民主人士的上书针锋相对,但王室又面临着一场实实在在的挑战。因为伊斯兰主义者的目的很明确,即借伊斯兰之旗号,来改变现存

政权。1993年《中东报》先后刊登了对伊本·巴兹和高级马里玛委员会部分成员的访谈。从其内容可以看出,沙特伊斯兰主义者不但有发展的势头,而且更趋于激进。这两年发生的一系列的暴力事件证实了这一点。

面对国际压力和国内各种政治势力的威胁,王室政府作出了较明智的抉择。一方面,它在宏观上强化王国的伊斯兰基本特征,以保证普通穆斯林对政府的忠诚。另一方面,进行适度的政治变革,以缓解国内民主力量要求参政和呼吁政治改革的压力。法赫德于1992年3月(伊历1413年8月27日)发布第91号国王敕令,命令成立协商会议。毋庸置疑,这是各种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

三、沙特协商会议

沙特协商会议的成立与运转要依照《协商会议条例》(以下简称条例)的规定而行。《条例》共有30条。有关协商会议性质和法律依据的2条;有关协商会议组成、权限以及会议成员任命的条款共16条;有关行政事项的3条;关于财政事务2条;还有其它条款。

《条例》第1、2条规定了协商会议的性质,即协商会议的基础是安拉的教导,其工作原则是严守安拉的经典和使者的“逊乃”。

根据《条例》第13条规定,每一届协商会议的期限为希吉莱历(或称伊斯兰教历)的4年(希吉莱历的一年是354.11天)。

(一)协商会议的组成

根据《条例》第3条规定,协商会议由主席和120名具有工作经验和专业知识的委员组成。但是于1993年(伊历1414年)成立的第一届协商会议成员只有60人。在1997年(伊历1418年)成立的第二届协商会议成员增至90人。2001年(伊历1422年)成立的第三届协商会议成员达到120人。此届协商会议主席是谢赫·萨里哈·本·阿杜卜拉·本·穆罕默德博士。他于1950年出生,拥有伊斯兰法学博士学位。副主席是比凯利·本·萨里哈·艾布伯克尔·闪塔。他于1934年出生,1967年在美国获公共管理学硕士学位。哈目德·本·阿卜杜·阿齐兹·阿卜杜·穆哈欣任秘书长。此人1939年出生,于1972年在美国获公共关系学博士。

协商会议依据《条例》第19、21条,下设一个总委员会和若干个专业委员会。总委员会由主席、副主席和各专业委员会的负责人组成。其主要职能

是:为协商会议和各专业委员会制定总的、可行的工作计划;制定协商会议的日常议程;解决在经由主席或协商会议委托的有关会议讨论或表决中出现的意见分歧。总委员会的决定被视为最终决议;制定协商会议及各专业委员会开展工作所需的各项章程。

专业委员会成员不能少于 5 人,其主要工作就是研究讨论与解决由协商会议委托的相关问题。本届协商会议有伊斯兰事务,社会、卫生与环境事务,服务与公共设施,外交事务,行政管理,公共安全事务,文化与宣传事务,财政事务,交通与通讯,教育与科学研究,经济事务等 11 个专业委员会。

(二)协商会议的职能

其职能主要是审议经济、社会发展的宏观规划,并提出相关意见;研究各项条例、国际协定和条约以及各种优惠政策,并提出相关建议;负责解释各项条例;审议由国家各部委和其它政府机构提交的年度报告,并提出相关建议。

协商会议的各项决议由主席呈报大臣会议主席,并由他移交大臣会议讨论,如果两者发生意见分歧,则由国王做出决定。同时,各项条例、国际协定和条约以及各种优惠政策需经协商会议审议后,才能以国王敕令的形式公布并生效。

(三)协商会议的运作

由协商会议秘书长安排例行的或紧急的会议日程及要讨论的事项。通常,由主席主持召开会议。主席因故不能参加会议时,由副主席代为主持。协商会议的任何决议都需要包括主席、副主席在内的 2/3 以上的成员出席,多数票可通过。如果票数相当时,主席赞同的一方获通过。

《协商会议条例》的关键集中在第 15 条和第 18 条,即协商会议具有立法与监督的职能。

在立法权方面,其主要表现在:1)审查各种制度与条例。对各类章程在其颁布前进行审查,并提出其建议或进行修改。还可以对某一制度或章程有无制定的必要作出决定。2)研究、完善已颁布执行的制度,并提出修改意见。3)负责解释各项条例。4)审查各项国际条约与协定。5)审查各项优惠条款。

在监督权方面,其主要表现在:1)对国家的总体政策发表意见。2)审查国家发展计划与报告协商会议时要审查由国家发展规划部提交的经济社会发展总规划,对此予以肯定或提出相关的修改意见。3)监督计划的执行情况。4)审查由各部委及其他机构提交的年度报告,借此协商会议了解政府的工作情况。5)协商会议在其大会或小组讨论期间,可要求

相关的政府官员到会,并就协商会议提出的询问予以回答。

四、沙特协商会议的特点及其意义

从沙特协商会议的性质、组织结构和成员构成来看,它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传统与现代化相结合

其主要表现在以伊斯兰“舒拉”精神为基础,汲取西方现代民主制度中的某些成分,并加以整合与改造,使之更符合沙特国情和王权统治的需要。仅从沙特协商会议的主席和副主席的人选上就能反映出这一点。这是因沙特特殊的宗教地缘因素而决定的。首先,半岛是伊斯兰教、伊斯兰文明的发祥地。尤其是在世界穆斯林心目中占有特殊地位的伊斯兰教二大圣地都在沙特境内。其次,沙特家族统治的基础是与宗教势力的联盟。自先王穆罕默德·伊本·沙特与宗教改革家穆罕默德·伊本·阿卜杜·瓦哈比的结盟开始,这种联盟一直未断。如今“乌里玛”(宗教学者)阶层对沙特王室统治的影响虽有所减弱,但它仍可随时对王室统治的合法性提出挑战。最后,虽然资产阶级民主势力和自由派人士的队伍不断扩大,但他们缺乏坚实的社会基础,社会影响远远不及“乌里玛”阶层。鉴于此,法赫德国王强调协商会议的伊斯兰属性,以显示沙特的协商会议不是异端邪说,也不是西方民主制度的翻版,而是对传统的伊斯兰民主制度的继承和发扬。此举可以达到受西方民主思想影响的社会精英与保守的宗教阶层相互制约的作用,从而平衡双方的力量,有利于王室统治和国家稳定。

(二)独立化

首先,独立化主要表现在协商会议的成员、行政与财政的独立。根据协商会议条例第 9 条,协商会议成员为专职人员,不能兼任政府其它部门的职务或经营任何公司。其次,根据第 2 条,其成员由国王直接从各行业的知名人士中选定,从而防止利益集团的影响。在行政方面,协商会议是个独立的机构,不隶属任何部门。其主席直接向国王负责。在财政方面,协商会议的财政预算直接由国王批准和监督使用,从而减少了政府其它部门对它的影响。第三,每 10 名委员可联名提出制定或修改某一制度的提案,此提案由协商会议主席直接上报国王。

(三)制度化

从 1926 年到 1992 年协商会议的曲折经历看,沙特家族的统治者此前虽然有向社会名流征求施政

意见的传统,但随意性很大。而以国王敕令的形式颁布的《协商会议条例》、《协商会议内部章程》、《对协商会议委员进行调查的规则》、《协商会议委员的权利与义务》等条例与规章制度对协商会议的组成、权限、运作、成员任命等事项做了较为详细的规定,做到有法可依,有章可循,从根本上保证了其正常运转,避免了随意性,实现了制度化。

(四)浓厚的专家治国论色彩

浓厚的专家治国论色彩。这是新兴中产阶层队伍不断扩大和他们迫切希望参政议政、扩大自身权益的必然结果。这一特点在协商会议成员的构成中尤为突出。例如第一届协商会议共有60人,拥有博士学位者占50%以上,而且绝大部分毕业于英国各大学。在第三届委员中拥有博士学位者上升到64%,硕士占14%。同时,在这一届委员中高达80%的人均有在美、英、法等西方国家学习深造的经历。

由此可见,沙特协商会议与西方的议会有很大的差距,但却汲取了其诸如立法权、监督权的主要特征,这标志着王国政治机构发生了重大变化。因为,在此之前沙特大臣会议是王国政府行政机体,它不仅拥有行政管理职能,而且具有立法职能,即它负责制定和修改法律、规章制度,批准国际协定和条约,并负责解释它所制定修改的法律章程。也就是说,政府既是政策法规的制定者,也是其实施者和监督者。显然,这不利于提高政府工作效率和防止其政策出现重大失误以及官僚腐败。尤其在王国实施投资巨大的发展计划时期更是如此。因为许多人都紧盯着发展计划的大馅饼,力图从中多分得一块,因此,金钱和权力融为一体。协商会议对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宏观规划的审议,减少了政府决策中出现失误的几率。而对国家各部门的年度报告的审议,不仅是对政府工作的监督,而且也是在政策上对政府进行监督,因为政府的收支往往反映政策的倾向。比如伊历1422年11月13日(公元2002年1月27日)协商会议对政府提交的关于继续执行六五计划中第四年的目标和项目的报告进行了研究和表决,最后在51/43号决议中作出同意决定,但提出五点具体要求,要求落实之。另外,由大臣会议提交的各项法律草案、条例、国际协定和条约等都要经过协商会议的审议和表决后才能生效,如伊历1422年4月3日(公元2001年6月25日)协商会议作出第6/7号决议,批准沙特加入国际空运联盟的决定。同年7月2日第8/9号决议,批准沙特外交部与印度外

交部达成的相互协调与协商备忘录。同一天,第8/10号决议,批准国际伊斯兰教科文组织对其宪章和内部章程所作的修改。从中可以看出,协商会议虽在立法上未取代大臣会议,但对其进行了较有效的制衡。以伊历1422年为例,协商会议在当年3月13日(公元2001年6月5日)至12月28日(公元2002年3月13日)共作出49个决议,涉及国内和国际事务。这表明协商会议已成为王国政体的重要组成部分。也预示着王国向政治民主化已迈出关键性的一步,其意义深远。

如果说,在协商会议成立之前,沙特政体是国王和大臣会议共掌政权的二元君主制的话,协商会议的成立则使这一体制朝着国家权力相互制衡的现代民主政治的方向发展。首先,可以说它打破了王国的传统政治观念,不再把合理运用公共权力系予统治者的信仰和品德,这一点对政治民主的发展至关重要,因为它是民主思想的基础。人们意识到无论从政治学的角度讲,还是以历史实践经验看,运作政治权力的主体仍是人,他与其他社会成员一样具有不可能消除的个人利益,并且是通过政治权力的运作来表现和实现的。因此,如果没有适当的制衡制度来约束政治权力的运作,其被滥用是不可避免的。诚如卡尔·波普所言:“我们渴望得到好的统治者,但历史的经验向我们表明,我们不可能找到这样的人。正因为这样,设计使甚至坏的统治者也不会造成太大的损害的制度是十分重要的。”

其次,虽然“舒拉”由于源于《古兰经》和圣训以及先知和其弟子们的言传身教而在伊斯兰教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在传统的伊斯兰政治学说中民主是通过“契约”来体现的,即统治者与臣民之间存在一种契约,其基础是《古兰经》、圣训,以及穆斯林大众的利益,它同时要求臣民对统治者合法性的承认与服从。但遗憾的是,由于历史及其他原因,穆斯林在权力制衡方面的研究严重滞后导致在正统哈里发之后,统治者只强调民众对其合法性的承认和服从,宣扬他作为真主在大地上的影子而对权力的垄断。因而在“舒拉”失去了原义的同时民众失去了应有的政治地位。这在伊斯兰历史的发展过程和传统的哈里发制度中暴露得很清楚。沙特协商会议给伊斯兰“舒拉”概念赋予现代政治涵义,厘清其范围,明确其职责是在一定程度上对传统的反思,和对其积极因素的挖掘和发展。另一方面,协商会议的成立在反映大众政治意识的觉醒的同时会进一步推动它。

(下转第87页)

造的价值要多于劳动生产率低的国家国民劳动的状况。因为,“只要生产效率较高的国家没有因竞争而被迫把它们的商品的出售价格降低到和商品的价值相等的程度,生产效率较高的国民劳动在世界市场上也被算作强度较大的劳动。”^[1]因而生产率较高的国民劳动就会在同一时间内创造出更多的价值,从而表现为更多的货币。这就足以说明,为什么生产效率高的发达国家投入的活劳动少,却创造的价值和剩余价值多,而生产效率低的发展中国家投入的活劳动多,却创造的价值和剩余价值少,根本原因在于劳动生产率的差别。

因此,科技进步、劳动生产率提高,对于单个国家而言,其经济意义在于同样的劳动耗费可以表现为更多的国际价值,因而一国提高劳动生产率,降低国别价值,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可见,中国要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必须改进技术,改善管理,提高劳动者的素质,从而大大提高劳动生产率。这样,不仅可以创造出更多的具有使用价值的社会财富,而且可以创造出更多的国际价值,更好地适应经济全球化的趋势和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对中国经济的全面挑战。

(上接第77页)

第三,协商会议毕竟为不同意见的表达提供了合法途径,扩大了参政的机会,尽管其空间有限。这会在客观上促进人人参政的现代民主思想观念的树立。因为,《条例》第4条规定,只要拥有沙特国籍,年龄超过30岁,口碑较好的沙特公民都有机会当选协商会议成员。虽然在实际操作当中其他一些诸如文化知识、社会背景、地理因素、实际工作经验因素是予以考察的主要对象,普通群众离此标准仍有相当距离,但是从理论上讲,它为普通群众参与国家事务提供了机会,至少使社会精英参政的可能性大大增加。协商会议成立后的成员人数不断增加从一个侧面说明了这一点。1423年8月23日麦地那报等多家媒体详细报道了协商会议进行讨论的全部过程,这是了解协商会议的运作情况及获得公众支持的重要举措,也是让公众了解和参与国家事务的重要一步^[4]。

中东现代化的历史的实践证明,无视本国具体国情,不切实际地一味照搬他国发展的模式是行不通的。沙特王室基于巩固自身政权和国家稳定发展的考虑,在坚持王国伊斯兰属性(因为这是王室统治合法性的源泉)的前提下,寻找在传统与现代化之间的最佳结合点,谨慎地进行符合自己国情的政治变

总之,科技进步条件下,劳动内容的量大大增长,价值创造呈现出许多新的特点,认识这些新特点,对于我们正确理解和丰富发展马克思劳动创造价值的理论,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综上所述,科技进步条件下,劳动形式虽然发生了重大变化,但劳动的内容并未发生质变化,价值创造的唯一源泉仍然是抽象的活劳动。但是,科技进步和劳动形式的变化使商品生产概念的内涵和外延扩大,从而引起创造商品价值的生产劳动范围扩大,劳动内容的量大大增长,从而使价值创造呈现出一系列新的特点。

参考文献:

- [1]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 [2] 谷书堂,柳欣.新劳动价值论一元论[J].中国社会科学,1993(6):83-94.
- [3] 钱伯海.论社会劳动创造价值[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1993(12):15-25.
- [4] 张思锋.对科技进步条件下价值创造若干问题的思考[J].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01(10):22-23.

[责任编辑:陈志和]

革。沙特协商会议将传统因素与现代化因素揉合在一起,是政治现代化改革中的一次新的尝试。从实际情况来讲,沙特协商会议并未改变其君主制政体,也未达到完全制约王室权力和国家权力相制衡的目的。但它在穆斯林对其传统的反思、发掘与发展其中的积极因素,培养民主意识,提供适合国情的发展思路等方面的潜在意义远远超过了其现实意义,对本国未来的政治生活会产生深刻影响。它虽有待完善,但仍不失为人类智慧之体现。同时,它是沙特各种政治力量消长的反映图和王国政治民主化进程的晴雨表。通过它,我们能较为客观地把握其未来政治走向的脉搏。

参考文献:

- [1] 刘军宁.民主与民主化[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 [2] 黄民兴.沙特阿拉伯——一个产油国人力资源的发展[M].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1998.
- [3] 王铁铮.沙特阿拉伯的国家与政治[M].西安:三秦出版社,1997.
- [4] 刘进田.文化哲学导论[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

[责任编辑:杨彬智]